

吉尔·德勒兹

〔瑞典〕 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Frida Beckman

Gilles Deleuze

非外借



吉尔·德勒兹

〔瑞典〕 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Frida Beckman

Gilles Deleuz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尔·德勒兹 / (瑞典) 芙丽达·贝克曼著; 夏开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Gilles Deleuze

ISBN 978-7-305-20978-9

I. ①吉… II. ①芙… ②夏… III. ①吉尔·德勒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667 号

Gilles Deleuze by Frida Beckma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17,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Frida Beckman,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7-11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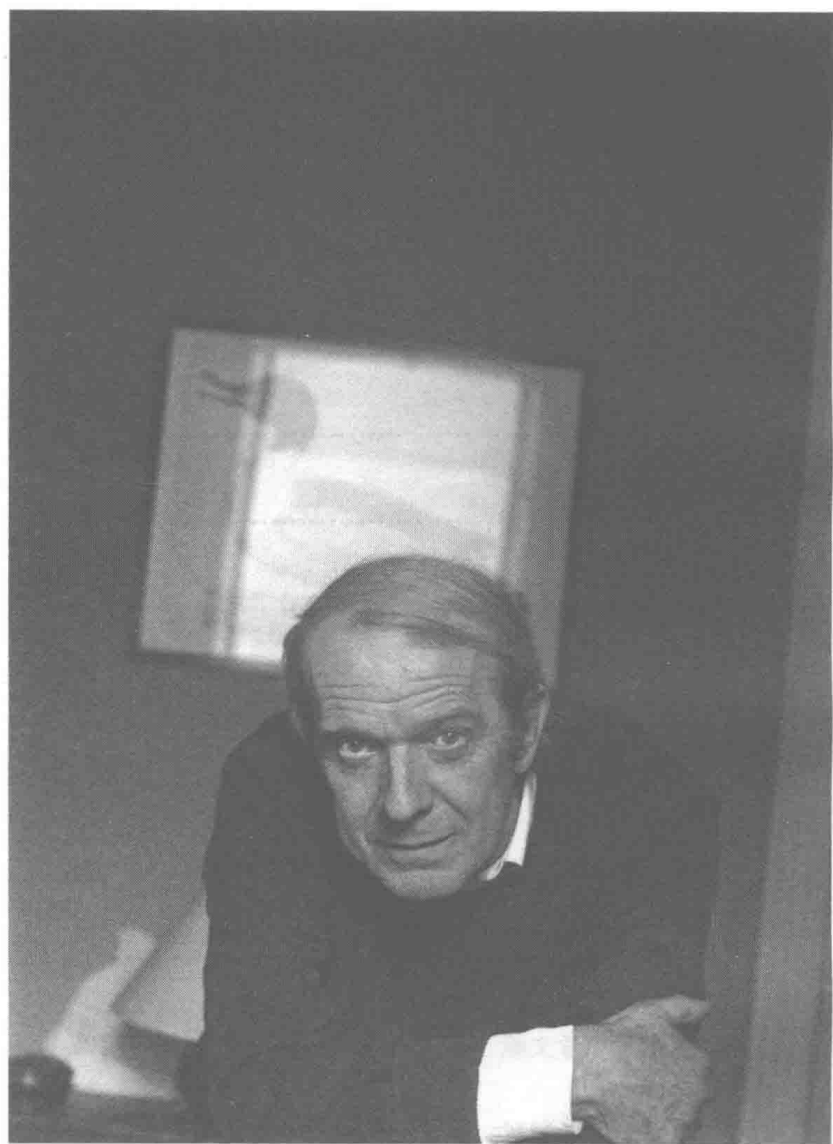
书 名 吉尔·德勒兹
著 者 (瑞典)芙丽达·贝克曼
译 者 夏开伟
责任编辑 付 裕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5 万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978-9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	001
1 一个孩童	010
2 一名学徒	022
3 一段友谊	041
4 一次实践	070
5 一种生命	097
结论	113
参考文献	127
参考书目	163
鸣谢	176

前 言

一生中总不乏笨拙的行为、易损的健康、孱弱的体质，以及构成人之魅力所在的口吃(stammering)。正如风格乃是写作之魂，魅力正是生命之源。¹

一谈作者的生平，吉尔·德勒兹总要摆一副意味索然的样子。或者换个没那么极端的说法，通常而言，作者的生平多少都会映射在他们的作品里，德勒兹却认为，作家与作品之间鲜有关联。其实，对二者之间的关联不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作为二十世纪最富影响力的欧陆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把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总结得如同浮光掠影，轻描淡写了这位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生平：“他出生，他思索，他逝世。”与很多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一生不过是一些琐碎轶事。假若如此来回顾海德格尔的生平，这就不免显得有些讽刺。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关联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位哲学家的生平与其哲学的关系，不敢忽略任何细枝末节。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尽管国际研究界详悉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意气相投”，2014年出版的“黑色笔记本”

(Black Notebooks)却还是迫使他们思考:海德格尔的政治信念不仅是其个人、其事业上的污点,也是其哲学思想上的污点。鉴于这一系列笔记本皆指向了海德格尔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在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间划界便饱受诟病。这足以让人质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信念,即我们在阅读柏拉图或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是否真能做到什么都无所谓,任由“时代之风暴将他们席卷四处”。就阿伦特看来,他们的思想并非源自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是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²

以上所关切的问题展现了,从具体生活之紊乱中抽身而出的缜密哲思,该如何在男性主导的哲学传统中继续留存。女性哲学家很少能拥有这种脱离具体生活的完美。确实,对阿伦特其人的关注,以及后世对她与海德格尔短暂私交的关注,最好地说明了人们对于女性思想家,还是更加关注其私人的具体生活。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对哲学家生平和作品进行区分的做法。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声称他逐渐意识到“至今所有伟大的哲学,要么是其作者的私人声明,要么就是一类未被意识到的非自愿式自传”。³ 雅克·德里达援引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生平的草率描述,但他不赞同海德格尔的做法,而是对此加以否定。德里达建议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把作者的生平当作“经验性偶然事件的汇编”加以排斥。他主张哲学家的传记必须“被重新纳入考量”。在德里达看来,哲学家们的政治信念尤其重要,但更广义而言,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同样重要:“哲学家为什么要将自己无性别地呈现于作品之中?他们又为何要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从作品中抹去?”⁴ 德里达并不是说作者生平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就好像前者可以用于解释后者;而是说,思考纯粹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即不存在一种毫无踪迹的文本。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正式宣布“作者

已死”，米歇尔·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又对此进一步阐释，此后，将作者与文本直接关联起来的情况是越来越罕见了。巴特坚信作者绝不会超前或超出写作，相反，作者诞生于文本。作者的诞生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伴随读者每次的阅读经历而诞生。因为文本从现存的诸文本中涌现而出，所谓作者也并非在表达“自己”，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文本汇集起来，使各种文本遭际彼此。这么看来，给予一个文本以作者就是“为文本强行设限，以一个终极所指来粉饰文本，从而终结写作”。⁵

对德勒兹而言，聚焦于人物生平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将其记录，这份记录不仅定义了还不可避免地限定了它所表达的一切，这有悖于德勒兹对于作者生平的看法，也有悖于他整体的哲学思考。通过为个体设限并赋予其一个具体的形态和一个终极所指，创造一个被定义的个体以及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人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关闭”。然而，对我们而言，仅仅知道德勒兹出生、思索、逝世的事实还远远不够；我们渴望知道更多。受邀写作这本书之前，我曾试图告诫自己一些事项，其中有四点和我要写的这本书尤为相关。第一点，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那就是德勒兹他本人所秉持的怀疑主义，他质疑将个体视为一个既定的统一体的做法。当然，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为个体写一部历史。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这么做，但至少我们现在书写的这本传记不是这个类型。通常，这类传记书写都有其依托的前提，而且鲜有人觉得有必要去质疑这些前提，例如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这些最为核心的概念。同样，人们对于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一直暗暗怀揣着先入之见。不可否认，先入之见的确有其实用性，它们能让传记的作者和读者更加易于辨认手头的意义单元和逻辑联系。然而，我注意到，为哲学家作传还应另当别论。原因在于，当我们把

哲学等同于最有名的哲学家时，我们便趋于认同了解他们的生平与理解他们的思想之间并无关联。尽管总有人认为哲学家的生平与其思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如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所示，我们依旧难以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传记来反思二者之间的关联。⁶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从而为德勒兹写出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哲思的传记，我不能或者至少绝对不应该重拾关于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的先入之见。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观念，即捕捉一个人的一生，并将其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呈现；聚焦于“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法按时间顺序组织、理解并“认识”生命。实行这些想法的传记书写必遭德勒兹本人的极力排斥。

第二点，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前提，就是那本厚达 650 页的传记，它记录了德勒兹与其屡次合作者菲利克斯·瓜塔利(Félix Guattari)二人的生平。尽管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的这本《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交错人生》(*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2007 年出版；英译本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2010 年出版)存有些许争议，但对任何一位迫切想要了解德勒兹生平巨细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渴望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多斯的那本浩繁巨制和我这本传记有诸多不同，篇幅长短并非唯一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目的和信念上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两点不同之处我还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我写此书的志向和局限至关重要。显然，这两本书的相异之处首先在于：多斯的书对德勒兹和瓜塔利二人的生平都给予了关注，而我的著作只聚焦于德勒兹的生平。多斯对瓜塔利的关注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重要，因为瓜塔利常常被置于德勒兹的阴影下。在批评话语中，人们提到德勒兹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在说他们二人的合著之作。这种

倾向并非仅仅限于“后德勒兹-瓜塔利”语境，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勒兹自己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瓜塔利的一封信中所写：“人们把你抹去，还让我变得抽象。”⁷ 尽管这种倾向至今依旧存在，但瓜塔利本人的著作因其自身的价值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该语境下，加利·格诺斯科(Gary Genosko)是一位核心人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格诺斯科就一直在努力强调和阐明瓜塔利作品的重要性。多斯的传记很好地印证了奥斯本的判断：“这是对德勒兹-瓜塔利思想第二次新兴的接受：瓜塔利思想研究；或者用哲学家埃里克·阿利耶(Eric Alliez)的话来说，这就是‘瓜塔利-德勒兹效应’。”⁸ 换言之，对瓜塔利的关注大受欢迎。

我们两人所作传记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在于，多斯的研究大部分基于访谈资料，其中既包括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因而，他的传记翔实地呈现了德勒兹生活中众多不同的事件，促成了一本如此繁博详尽的双人传记，并丝毫不损读者的阅读兴致。你们将会看到，我会多次提醒读者参阅多斯所写的传记，以获得德勒兹生平中各色事件的详尽描述。⁹ 基于以上考虑，的确会有些读者选择研读多斯的版本。您现在捧在手心的这本书，囿于篇幅之限，必然无法如此关注细节；再者，这也并非撰写本书的意图。对于此书，我的愿景在于将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共置于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首先便是试图消除追求此目标所招致的哲学性摇摆。¹⁰

撰写该传记的第三点问题就在于，我敏锐地意识到钻研德勒兹著作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也都精通详悉其作品；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我遗漏的细节，可能也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所写的内容。基于本书的框架，我肯定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我必定无法事无巨细地还原德勒兹的生活，也不能全面地展现其哲学思考。这

本“小书”肯定无法囊括德勒兹所有的概念——因为他创造的概念确实不少。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仅将焦点汇聚于德勒兹的部分概念，即一些似乎能与德勒兹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最富有成效的联系的概念。为成功找出德勒兹生平与其著作之间的关联，我决定先从其一个概念入手。¹¹这个概念就是配置（the assemblage [agencement]）。该概念缘起自德勒兹与瓜塔利，他们利用该概念重新思考个体（the individual）这个观念。他们二人认为，一次陈述绝非是个体的，相反，它总是集体的。力、身体、客体和界域（territories）共同组成由欲望驱动、具有特殊功能的暂时性配置。当组成这些力的成分加入了机器性（machinic），这些力便形成了配置。机器性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在强调配置的非个人性（nonpersonal）与非人性（nonhuman）的同时，还揭示出配置是动态的。配置运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作为机件的联合。对此，德勒兹和瓜塔利解释道，配置具有双面性：“它一面是集体发声的配置；另一面则是欲望的机器配置。”¹²配置这个概念排斥个体和个人这样的观点，它表明发声并不会反身指向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共同体（community）应具备的功能”。¹³

如果我们在德勒兹的传记中勾勒出其生平和著作，以此获悉它们是何以浮现、聚集并成为具有集体性功能的配置，那么，我们便有可能描述其一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借此阐释他的哲学。德勒兹声称，我们有办法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贯穿个体的力度与多样性，而不是用它来指涉自我（ego）、个人（person）抑或主体（subject）。这并不是建立在屈服之上的哲学史之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相反，这种去个人化建立在爱之上，承认“独特性、字词、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小事件”，这些都聚集于这个名称之下。¹⁴通过聚焦于这一系列的力、客体、身体和界域，我们才有可能

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时间性和驱动它的欲望，才有可能知道它们如何诞生并不断出现、环复于德勒兹的一生与其著作。这本书因此可划分为若干配置：第一部分题为“一个孩童”(A Child)，这一章主要记录德勒兹早年的生活；最后一部分题为“一种生命”(A Life)，这一章节主要写德勒兹的逝世；中间部分为三章，分别是“一名学徒”(An Apprenticeship)、“一段友谊”(A Friendship)和“一次实践”(A Practice)。这三章分别对应德勒兹著作的三个阶段：一开始，德勒兹的写作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几位哲学家；随后，他开始与人合著，其中，瓜塔利就是他主要的合著伙伴；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勒兹的创作主要专注于艺术和电影。我有意把每一章的标题都写成单数形式。其作用是强调每一部分所勾勒出的德勒兹的私人生活和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的奇点。

我的最后一丝忧虑就在于，我于此所作出的关于他人一生的诸多断言。对于德勒兹的一生，我的了解远谈不上完整，而且这些了解还全都源自一些二手资料。德勒兹的一生为其家人和朋友所珍视，他们必定知晓更多本书未能记载的内容。因此，我想强调，这部批评性传记并非基于对德勒兹亲朋好友的采访，其目的也不在于对其一生刨根问底，而是致力于在德勒兹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建立一些成功的对话。不可否认，为德勒兹写这么一本传记其本身就有点“变味”，整本书所囊括的方方面面都与德勒兹的哲学观念相悖——用巴特的话来说，我的写作是在试图“封闭”(close)；倘若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我则是在“捕获”(capture)。这可能恰恰是引起我写作兴趣的原因。我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对“嬉戏空间”(room for play)的寻找视作一次挑战。只有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时候，这种空间才会显

露。这并非要与其“思想要义相吻合”，而是要“将这位思想家引向另一条小径，并在那里消解他的声音”，以此来创造德勒兹所力求的语言中的异邦语言(foreign-language-within-a-language)¹⁵。艾丽诺·考夫曼(Eleanor Kaufman)认为与德勒兹同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心的背道”，受此启发，我试图使这嬉戏空间成为可能。考夫曼指出，走进德勒兹的著作还有另外一条离经叛道却又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他的文本，矢志不渝地运用他的概念，不过这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他的哲学。¹⁶德勒兹认为，紧随他人无异于把创造、遭际和生成拒之门外，这三者是人生与哲学的要义所在。因此，这部批评性传记指出，德勒兹的思想并非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去关注德勒兹生平与其作品中的那些创造、遭际和生成。德勒兹是非常具体的存在，而其具体化又十分艰辛，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诞生于其文本、遭际和友谊之中。这



德勒兹：创造、遭际、生成。于突尼斯豪迈特苏格(Houmt Souk)的涂鸦肖像画。

便是我著书的愿景——我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写成一本生平纪年或是“一个终极能指”以完结写作；我希望能绘制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德勒兹一生的遭际。如此按图索“迹”，我们方能一览其人，一窥其思。

一个孩童

依靠总角岁月进行文学创作通常就将文学写成了细微的私人琐事，这十分令人厌恶……也纯属胡说八道……因此，作者的任务并非去挖掘家族史……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孩童，以孩童的身份去感触世界，并让世界重归孩提时代。这才是文学的任务。¹

人们通常认为，吉尔·德勒兹平淡无奇地过完了一生。1925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巴黎的第七区。除去青年时的一段岁月，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德勒兹的父亲是一位保守的右翼工程师，名叫路易·德勒兹；其母亲奥黛特·加玛穆尔(Odette Camauier)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德勒兹说，他母亲无法和工人阶层共享诺曼底的海滩，他回忆起母亲曾把工人阶层称为“那种人”。²直到十四岁，德勒兹都一直在打网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不打了。1940年战火燃及法国，而当时德勒兹一家正在诺曼底度假。德勒兹正值十五岁，他的父母决定将他与哥哥乔治留在诺曼底。兄弟俩最后在那里的廉租屋寄宿，还读了一年书。他可能是觉得这段往事有些不堪回首，但也有可能是觉得这段经历

不值一提,总之,德勒兹并不觉得他的童年有什么值得谈论的。

为了解释这一点以便开始认识德勒兹,我们也许要质问一下“不堪回首”和“不值一提”之间的张力关系。毕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意义非凡。在多斯所作的传记中,他发现德勒兹之所以抗拒其童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德勒兹的双亲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右倾又没教养,这很难让他找到归属感。事实上,与德勒兹的朋友和哲学同侪相比,他本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算不上政治积极分子,但其父母的保守主义和反动思想铸就了他今后哲学的隐性(有时候甚至是显性)的批评目标。其二,德勒兹成长于其兄长之死的阴影之下。乔治在战争期间参与抵抗运动时为德军所俘,在前往集中营的路上便不幸逝世。乔治因此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与之相比,吉尔则暗淡无光。尽管德勒兹随后对此表示释怀,但他曾有一次向作家兼好友的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坦言,他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父母的这次叛离。多斯因此注意到这位不在场的兄长在德勒兹童年的塑形中意义非凡。³的确,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孩子不仅失去了他的兄长,而且还要在其阴影下感受相形见绌,这也难怪他将自己的童年视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倘若要将这段童年谎称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性质又完全不同了。那德勒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里强调的并非“童年”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一个人“自己”的童年。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孩童大体象征着一种建构功能。它反复出现,遍布于德勒兹的写作之中,并具有不同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其功效也并不一定全都是纯粹积极的。⁴一个孩童既是脆弱的,同时又孤立无助,但德勒兹经常提到的还是孩童的这个层面:孩童还未完全被纳入稳定(或者说克分子)的结构。对德勒兹而言,克分子结构便是生成的对立面,正如其结构所示,它具有清晰

明了的边界。⁵相反,在德勒兹的哲学中,生成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利用这个概念将关注的焦点从存在转移到生成。倘若存在是一个固定点以开始或结束,生成则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德勒兹并未将存在看作生成这个过程所瞄准的靶子,而是将生成自身强调为所有生命的基本状态。这么一来,重心就落在了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世界里的临时组织之上。这种持续的变化和差异在孩童的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成人世界很快便用克分子结构对本质上实验性的身体、性征与主体进行超编码(overcode)。因此,孩童的形象蕴涵将成年的固化结构解域化(或扰乱)的潜能。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对德勒兹而言是个十分重要的术语,在其与瓜塔利的合著之中尤为重要。它是对界域化(即更加固化)的身体、空间或关系的解放,以展示它们视作自身固有特征的差异。故而,孩童自身就具有一种生产性的功能,该功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生命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和具有创造力的侧面。

一位重构童年记忆或事件的作家或传记作家,都有可能在克分子还未结构之前投射出一种克分子逻辑。因此,具有实验性的事物被夺走并被驯服成非实验性的东西。我们目之所及,毫无生成可言。故而,写作不应该是一件个体的私事,也不是回归一个人自己的童年。对德勒兹而言,这样的写作使生活残缺不全,是对生活的一种贬低和辱没。相反,写作应该是一种生成——“随便成为什么,但就是不要成为作者”。⁶为了让这种生成成为可能,你的写作必须让你走出神经官能症(neurosis),而不是深陷其中。这么一来,你可能想要写一段童年往事,但这绝不是你自己的童年。通过将写作转化为一种生成-孩童的过程,具有实验性的东西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为实验和生成创造了空间。这似乎意味着将自身排除在那个决定身份的结构之外,而非将自己写入其中。